适应新时代 创造新理论

——重温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发表过两次谈话，集中体现了他对中国思想界“历史使命”问题的深刻思考，其中的一些独到见解对于当今中国思想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履行肩负的“历史使命”，仍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借鉴意义。

□ 李庆英

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以下简称《年谱》）记载：1959年12月10日，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次读书活动一直持续到1960年2月9日。在此期间，毛泽东围绕“世界观和方法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深邃的思想观点。读完《年谱》中毛泽东的相关谈话内容，我觉得其中有两次谈话特别值得重温和重视。

第一次是1959年12月10日谈话：为中国思想界的“历史使命”问题“破题”

1959年12月10日，毛泽东在读到教科书“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这一段时发表了一次较长谈话，首次提出“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可以说，这次谈话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历史使命”的“破题”。从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就这个命题提出的主要观点。

这个命题是针对党内存在的混乱思想和错误观点提出的。从历史情况来看，当时党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存在一些混乱思想，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学与用分离的“两张皮”现象。对此，毛泽东在1958年给党内领导干部所写的《关于读书的建议》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面临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另一种是固守马克思“老祖宗”著作的教条主义倾向。即当时党内有不少人认为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一方面流露出某种对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消极情绪，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片面观念。对此，毛泽东严肃地批评说，“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这个命题清晰界定了“新的著作”“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家”所具有的政治品格。毛泽东在谈话中明确提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人类社会思想发展史鲜明地昭示，任何一种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新理论，都是为解决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而产生的，必然要为现实政治服务，这是一条基本规律。对此，毛泽东深刻地分析说：“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

这个命题凸显了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是一个高度重视思想武装和理论指导的政党，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无疑成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奠基者”。他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后，就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问题之“的”，从而写出了一系列指导革命实践的重要著作。正如他所指出：“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面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全新的历史课题，中国共产党人急需理论指导，但是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都十分薄弱，因此在一段时间里不得不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向党内干部提出要学习《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特别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不过，在毛泽东的认识中，别国的经验只能是启发和参考，而要解决中国自己的新问题，还必须形成自己的新理论，所以他严正地指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第二次是1960年2月9日谈话：为中国思想界履行“历史使命”提供科学方法论

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在读完“结束语”后，对教科书进行了一次总的评价。这次谈话主要是围绕如何“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展开的，这为中国思想界履行“历史使命”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对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1959年，毛泽东在杭州与胡绳等一起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创造新的理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的大脑中固有的，而是从实践中通过抽象的思维方法分析、总结和概括出来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基本观点。这一原理和观点要求，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思想界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必须立足于和植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经验。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战略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不久就清醒地认识到形成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实践局限性：一方面，他满怀期待地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另一方面，他又不无忧虑地指出“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所以，他深刻地总结说：“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写出新的著作”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法”。我们常常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绝非空话套话，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得出的一个最凝练的科学概括，凝结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义。这里的“方法”，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法。那么，何谓“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法”？我们从毛泽东在对教科书写法既“破”又“立”的评论中不难领会这一科学方法的内涵。在“破”的方面，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说：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在“立”的方面，毛泽东鲜明地提出，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

“产生自己的理论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产者，必须同时具备实践家的现实眼光和哲学家的思想方法，这种生产者也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界定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在这次读完教科书“结束语”的谈话中，他为“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提出了一种革命家与哲学家的“结合论”，指出：“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据此，他进一步分析指出：“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重读经典

用典释义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

【讲话原文】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

【出处】

里语曰：“明镜所以昭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鲁王为戒，改易其行，战战兢兢，尽敬朝廷，如此则无求不得。若弃忘先帝法教，怀轻慢之心，臣下宁负大王，不敢负先帝遗诏，宁为大王所怨疾，岂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诏敕不行于藩臣邪？此古今正义，大王所照知也。

——（蜀汉至西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吴主五子传》

【解读】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为中国古代著名的俚语，充分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自省精神。《三国志 ·吴书·吴主五子传》载：“里语曰：‘明镜所以昭形，古事所以知今。’” 里语：即俚语。意思是对照明镜是为了看清自己的面容，研究历史是为了了解今天的时势。成书晚于《三国志》的《后汉书·冯异列传》也有：“明镜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其实，它的出典还应更早。如《韩诗外传》卷五：“夫明镜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贾谊《新书》：“明监（同‘鉴’，镜子）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大戴礼记·保傅》：“明镜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说明这句俚语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共鸣。

《三国志 ·吴书·吴主五子传》是吴大帝孙权的五个儿子孙登、孙虑、孙和、孙霸、孙奋的合传。其第五子齐王孙奋在孙权去世后，不服从转迁豫章郡的命令，且数次越法行事。太傅诸葛恪上笺书劝谏孙奋，并引用这句俚语，提醒他以被赐死的鲁王孙霸为戒，改变自己的行为。

明镜照物，妍媸毕露，古人从镜子的物理中获得了人生的真知。《墨子·非攻》中引古谚云：“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韩非子·观行》称：“镜无见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怨。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唐太宗更是提出了著名的“三镜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揭示出照镜子与修身治国的关系。

历史是一面镜子，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文章中多次提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镜子论”。早在2004年，他就强调指出：“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人品，反映作风。”2013年9月25日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的讲话中，又引用了汉末魏初文学家王粲《仿连珠》中的一段“镜子论”：“观于明镜，则疵瑕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一语道出了以历史为镜鉴的目的和意义：“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杨立新）



顾炎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精神

□ 钱 逊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人们熟知的名言，现在常有人把它说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词之改，看似无伤于原意，其实丢掉了原话的根本精神。

此语出自明末大儒顾炎武，原话是：

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

这段话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提出了亡国和亡天下两个概念，并且加以区分。亡国，是指改朝换代，政权更替；亡天下则是指道德衰颓，人相争斗，社会风气败坏，动乱不安。其二，指出保天下是保国的基础。其三，提出维护社会道德，保天下人人有责。

把国家的安定，政权的稳固，建立在进行教化、提高人们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是中华文化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大智慧和优秀传统。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又说足食、足兵、民信三项立国的要素，必不得已而要去其二，则去兵、去食，“民无信不立”。《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见梁惠王说“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指出“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都强调人们的道德自觉和良好的社会道德是立国之基。顾炎武明确地区分保国和保天下，并说明二者的关系，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挥。

从区分保国和保天下，进而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可见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主要是指在维护文化、社会道德风气方面人人有责。这一点对于了解儒学十分重要。有一种认识，认为儒家有治国平天下之志，为实现此志，只有依附于当时之统治者，出仕为官。这是一种误解。儒家入世，关心时事和民族、国家安危，有治国平天下之志，然而并非一意追求做官。孔子处于礼崩乐坏的乱世，志在使天下无道改变为天下有道，周游列国。说“我待贾者也”，“苟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迫切期望有出仕为政的机会。然在不得诸侯信用时，他回答“子奚不为政？”的问题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并非只认出仕为官一途。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亦不论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其精神在忧以天下，乐以天下，以天下为己任，而不在追求官位。顾炎武区分保国和保天下，则是说明谋政保国需要有条件。在位，才有机会参与，即所谓“肉食者谋之”。而保天下，维护文化、社会道德风气方面，则人人有责。突出表现了儒者在道德、文化方面的担当精神。

顾炎武之后，清代一些儒士发挥“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思想说：

欲挽回天下之无耻，必视乎一二人之有耻。权足以有为，则挽回以政教；权不足以有为，则挽回以学术。即伏处一隅，足不出里闬，但使声气应求，能成此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将必有闻风兴起者。纵不幸而载胥及溺，犹将存斯理于一线，以为来复之机。（吴廷栋）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此一二人之心嚮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之心嚮利，则众人与之赴利。……然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曾国藩）

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变，必从一二人开始；影响世人，移风易俗，并非只靠位居高位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根据地位不同，在位的可以通过政教；不在位的可以通过学术；就是家居独处，也可以影响身边一二人；这一二人又可以影响更多人闻风而起；即使身遭不幸，也还是在自己身上保存下了文化的一丝脉络，可以成为将来文化复兴的种子。

所以，以天下为己任并不一定要出仕为官、在位谋政，而是不论在朝在野，随时随地，根据自己的处境、条件，自觉担当；不一定要有权力、地位、财富等资源，而最重要的是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

儒家对于文化的高度自觉的担当精神，是我们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柱。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过许多曲折，有过多次易姓改号，改朝换代；有过周边族群入主中原；有过列强入侵，面临瓜分亡国危险，等等。而我们民族能够度过这一切，屹立在东方，几千年古老文明未曾中断，绵延发展，儒家高度自觉的文化担当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是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这一点，在今天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着信仰缺失、价值观混乱、道德低迷、“仁义不施”、“上下交征利”等不良现象。面对如此危机，发扬“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精神，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传承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担当起“保天下”的神圣使命，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也是我们走出危机，实现中国梦的唯一正途。

干部国学苑

2016年第10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聚焦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 范丽君

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10期“本刊策划”栏目聚焦全面从严治党，与中央党校进修部共同邀请学者和中央党校部分学员从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抓“关键少数”、加强党性锻炼、改进党内政治生活、落实主体责任等不同角度进行了交流探讨。

怎样认识从严治党？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党的发展历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不断从严治党的过程，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的政治密码。

六中全会为何要制定新形势下的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斌雄等认为，当前加强党的领导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制定新形势下的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具有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既要传承和发扬党内政治生活优良传统，也要善于以新的经验指导新的实践。

从严治党的重点在哪里？中央党校第60期省部班民生与社会建设研究专题学员、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高建华认为，全面从严治党首在“关键少数”，要抓紧抓好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严格选任标准、严格监督管理、严格制度约束、严格执纪问责、严格锤炼培训，发挥领导干部强大的导向、示范和推动作用。

如何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加强党性锻炼？中央党校第60期省部班战略思维与领导能力研究专题学员、中央巡视组副部级巡视专员宁延令指出，加强党性锻炼是每个共产党员的毕生任务，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进一步强化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性、政治立场上的人民性，强化组织纪律。

基层领导干部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如何发挥作用？中央党校第67期厅局班文化建设与文化体制改革研究专题学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党委副书记郭红从思想、行动、方法措施等三方面强调，基层领导干部承担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责任，应深刻领会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实质，跟上中央要求，坚守责任担当。

如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中央党校第67期厅局班文化建设与文化体制改革研究专题学员、北京市地震局局长任利生提出，要构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党建责任体系，完善党建工作格局，加强党员干部党性锻炼，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健全考核机制。

一把手八小时以外的监督与自觉如何实现？中央党校第8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云南省楚雄州双柏县委书记李长平结合当地实践认为，八小时以外是目前一把手监督的盲点，要实现有效监督，必须立下规矩、完善制度、标本兼治。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对实现县域治理现代化有何意义？中央党校第8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委书记蓝捷指出，落实主体责任是对县域治理方式的大革新、大提升，必将加快县域治理方式现代化，护航基层经济发展、保障民生、维护稳定。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如何落到实处？中央党校第8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市委书记杨乃文撰文强调，要突出抓好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关键环节、有效落实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的政治责任，确保从严治党责任落地生根。

报刊聚焦